

与毛泽东一起用餐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在魏根深担任北京语言学院外语老师期间,他见过的最高层的中国人是毛泽东。“1965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了饭。”魏根深顿了顿,笑道,“不过,是2000多人一起吃的饭。”

魏根深至今保留着一条烫金字的红布嘉宾证,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之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留下的。在他的印象里,赴宴的都是“中国最有名的人”。进门的时候,每人会领到一张号码牌,座位都是规定好的。他那桌坐了12个人,只有他一个外国人。放眼全场,他也没找到金发碧眼的同胞。“现在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可能10万都不止,但那时候外国专家非常少,可能全中国都不超过50个人。”魏根深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政府从其他国家邀请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来,于是像他这样表达过赴中意向的外国人,才会收到代办处的面试通知。

魏根深的桌子离主桌比较远,他几乎看不清毛泽东。坐在魏根深左手边的宾客显然有备而来,时不时用自带的望远镜观望四方。“那是周有光,我觉得那天吃饭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周有光。”魏根深记得,周有光说自己原本是研究经济的,还在几家银行供职过,后来周恩来找到他,说既然你懂经济那么你肯定懂逻辑,你还是去搞语言吧,就调他入京去研究汉语拼音了。在魏根深认识周有光的时候,周有光已经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了。魏根深揣摩,可能是周有光希望了解一些关于英语现代化的研究,主办方才安排他们坐在一起。

在饭桌上,两个人聊着聊着,周有光提议魏根深写一篇关于汉语拼音的文章。魏根深饭后就开始动笔,写完后王还将文章译成中文,很快刊登在了《光明日报》上。几个月后,听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英语版本的《新约》,周有光又特地约魏根深去北京饭店碰面,说文字改革委员会想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将古代英语写就的经典著作改成现代语言的,考虑到中国也有很多古汉语写作的经典,周有光请魏根深回到西方后给他寄一本《新约》来作为他山之石。魏

（上接3版）

译作“Down to the Pool in Slips”,女导演看后掰着手指对他说:“‘女跳水队员’是5个字,你的英文怎么有6个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无奈之下,魏根深只能将片名调整成5个单词,翻成“Female Members of Collective Diving Team”后再交给她,对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他还给外文出版社翻译过《九颗红星向祖国》,但直至1966年他离开中国时,英译本仍不见出版。后来他才知道,那时的北京外文出版社已经不能印刷《毛泽东选集》以外的任何著作了。

他曾去国家图书馆(当时在北海公园附近)想查阅一本关于明朝的书,图书馆不允许他进入,直到北京语言学院给他写了份情况说明才被放行。“那时候的图书馆管理员,看护的好像不是书,而是国家机密。”更让他觉得匪夷的是,一些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读书、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他们的图书馆里有许多国外的学术期刊,但是都被锁起来了,连内部人员都不能借阅。

在魏根深看来,那时候的中国跟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着相当明显的时代特征。他印象最深的是总有填不完的表:去任何单位拜访,都要先在一张出入证之类的表上填上个人信息,走时还得填离开时间;那时北京一共20辆出租车,每次打车前也得填表,写明从哪里上车、到哪里下车。

根据规定,外国人是不能独自外出旅游的,必须报备警察局,还要安排地陪。这虽然繁琐,但魏根深还是尽力把握每次可能的出行机会。他挺喜欢平平常常的中国人,尤其是当他们对外的世界充满热忱的时候。

他去过无锡。走在街上,孩子们嬉笑着追着他跑,嘴里喊着:“苏联叔叔!苏联叔叔!”

他去过上海。人们在大马路上停下脚步,友好地跟他打招呼,问他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他开玩笑说自己是美军飞行员,大家惊叹起来,又追问他他的飞机是什么样的。

他去过西安。把地陪灌醉后,晚上一个人溜出去逛马路。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他,见他会说中文,又七嘴八舌地发问。有些男人问他非洲女人是不是很胖,他说他没见过,对方很遗憾。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他们与世界联通的一扇窗。

他去过香港。当他兴奋地告诉北京语言学院的师友,说自己有机会赴港时,通常只会换来担心的面孔。师友们讲报

上说香港很危险,到处是杀人犯、走私犯、小偷,让他没事别到街上去。他去了以后发现,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只是一处安静的小地方。

“红色魏根深”

1966年7月7日,魏根深结束了与北京语言学院签订的两年合约,前往美国继续学业。其实,他在剑桥大学获得本科、硕士学位后,就已经申请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当收到普林斯顿的入学通知时,他已经通过了中国代办处的面试,于是他告知普林斯顿的老师自己要去中国教两年书,对方表示这是极为珍贵的机会,学校愿意为他保留学籍。

到了普林斯顿,大家都对魏根深的中国经历很好奇——那时中美还未建交,普林斯顿还没见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人呢。学校请魏根深做一场报告,讲讲他的中国经历,现场座无虚席。在问答环节,魏根深收到了很多奇怪的问题。一名校报记者问他,中国人民是不是都在挨饿?他回答没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中国确实粮食紧缺,但从1963年起情况有了很大好转。

没想到,第二天他的讲座新闻登上学生报纸时,报道的是“Pinko Wilkinson says Chinese are not starving(红色魏根深:中国人并没有挨饿)”。魏根深很无语,他陈述的是客观情况,但这名记者显然认为他是在为中国说好话。他马上找到系主任,而后联系到报纸的编辑,谈了自己的想法。第三天,报上登了一则更正消息,表示他们可能对魏根深先生有所误解。

又过了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是“the Company”(即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打来的。他被带到校园外的一个小房间,眼前是一张北京地图。“你能指出北京所有公共电话的位置吗?我们探测不到。”CIA的探员对他说。魏根深听完笑起来,他告诉探员,不是他们的探测器出了问题,而是北京根本没有公共电话。“那时候电话在北京可是稀缺品,只有重要的机关和公司才会有啊!”

跟CIA的探员告别,魏根深忽然觉得,CIA的提问与那些他在无锡、上海、西安遭到的古怪提问,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那时候,彼此都有太多误解了。”

根据东亚研究院对博士生的培养方案,1967年,魏根深获得了去东京访学一年的机会。那时,恰逢日本发生“学生纷争”——激进的学生占领东京有名的高校及书店林立的神

田区,建立所谓的“神田解放区”,并与警方对峙冲突。在那一年里,每当一所大学因为运动停课,他就去另一间大学就读,“逃难”似地辗转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最后到了东洋文库。这一幕真是似曾相识,好像又见到了离开中国前目睹的疯狂与不可思议。

1970年,魏根深在普林斯顿接受了刘子健和牟复礼的指导,完成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1971年,他先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学。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向中心主任费正清提起自己有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笔记。费正清看了其中一章,便敦促魏根深尽快将笔记成书,这便有了至今仍在不断修订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的雏形——《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1973年,这本《手册》作为哈佛东亚专刊第49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哈佛访学时,魏根深已经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职,教授远东历史学。不过,去伦敦大学报到时接受的“训话”让魏根深不甚满意。他记得一个教务主任模样的人先讲了伦敦大学机构如何庞杂,而后表示如果教职员在20年内工作认真且成果显著,那么就有机会加入学校的高层组织,就是说可以成为图书馆买书委员会的一员。“这太老派了!”魏根深说,当时和他一同入职的还有2名年轻教师,听完这番话,大家都认为这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纷纷以最快速度离开了。尽管后来从该学院的历史上可以查到,魏根深当时已经被官方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有前途的汉学家”。

1973年,魏根深打算去中国山东继续学术研究。那时,他刚翻译完《山东清代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景甦、罗仑著,1959)一书,很想深入研究下这部分内容。他联系了一位曾经认识过的部长,提出他想去济南访学半年,但遭到婉拒。后来他才知道,根据规定,当时外国学者都不允许进入中国,更别提在中国研究中国了。“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只想做学术研究,但在那个时候,‘外国人’几乎等同于‘特务’。”魏根深说。

无奈之下,魏根深只能转而继续对日本的研究。在日本期间,极有商业头脑的他将不少日本画销售到欧洲市场,并偶然地结识了一名法国政要。没想到,这场邂逅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